地理學報　第四十九期：39-54 (2007)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49) : 39-54 (2007)

空間再尺度化的角力
全球化下的臺灣資通訊產業與國家機器

Contesting Rescaling
Taiwan's ICT Industry and the Stat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王振寰*

Jenn-Hwan Wang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cale to depict the contesting issue in Taiwan regarding the dilemma of political rivalry vs. economic integ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By using the case of th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the ICT industry –its embedded and dis-embedded in Taiwan, as well as its re-embedded in China,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Taiwanese state's reaction and its spatial strategies. It will show that the state's reaction has been self-contradictory- on the one hand, the national/populist project intends to bring the runaway economy under its control,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glocal state strategy aims to embrace the globalization tendency. This paper contents that the state's national/populist project overrules the glocal state strategy, as a result the ICT industry has become re-embedded in China even further as the contesting of scale continues.

Keywords: spatial restructuring, scale, the state, ICT, Taiwan.

摘　要

*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座教授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本文以空間尺度政治經濟學觀點描繪臺灣與中國之「政治對立—經濟整合」的矛盾現象，並以資通訊產業的空間再結構—鑲嵌於和去鑲嵌於臺灣、與再鑲嵌於中國的案例，來分析臺灣國家機器的反應和空間策略。本文認為，臺灣國家機器的反應是自相矛盾的：國族／民粹主義計畫試圖將外移資本帶回其管控之下，然而全球在地化策略則是朝向擁抱全球化趨勢。本文也指出國族／民粹主義計畫凌駕於全球在地化國家策略之上，使資通訊廠商與國家機器在空間尺度面向上持續角力的同時，卻愈益深深鑲嵌於中國的領土之內。

關鍵字：空間再結構、空間尺度、國家機器、資通訊產業、臺灣

前　言

當今臺灣政治經濟發展中最顯著的矛盾之一，就是其經濟逐漸與中國大陸整合，但是在政治上卻是與對岸的中國政權相互對立，甚至處於隱性的戰爭狀態中。以統計數字來看，臺灣對中國的投資從1990 年代開始就不斷增加，自 1952 到 2004 年為止，中國吸收了臺灣所有對外投資的 49.51%；而在2005 年，中國就吸收了臺灣對外投資總額的 71.05% (陸委會經濟處，2006)。由於中國的快速發展，臺灣、香港和澳門的經濟也逐漸被吸入這個巨大的經濟體中，也有人稱此為大中華經濟圈。然而在這個想像的經濟區域背後，卻是一個充滿矛盾衝突的政治緊張關係。臺灣的國家機器試圖以各種方法拉回其外跑的企業，而中國的各級政府則是反過來試圖以各種方法吸引臺灣資本的投資，來獲取政治和經濟的利益，並以武力恫嚇臺灣的國家機器。

這樣的一個「國家敵對－經濟整合」的矛盾現象，正是當今經濟地理學所討論的「空間尺度 (scale) 政治經濟學」的議題，而此一現象也特別適合用來解釋資訊通訊 (資通訊) 產業的跨界發展以及其與國家機器之間的關係。臺灣的資通訊產業是在國家政策積極支持之下所撫育出來的產物，由於國家機器的積極支持，臺灣的資通訊產業在產業結構中佔有的重要性愈來愈高，也在 1995 年之後，取代了傳統的紡織業成為臺灣主要的出口產業。在 1995 年，臺灣的資通訊產業的出口值佔所有出口產值的23.5%；而到了 2004 年這個比例升高到了 30.7%。臺灣資通訊產業也在世界市場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臺灣的資通訊產業在 1996 年產值佔世界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日本。不過由於臺灣廠商的大幅度外移到中國大陸，臺灣現今的產值佔世界第四位，而被中國取代 (資策會，2005)。在 2005 年臺灣的廠商生產了全世界 82.5% 的筆記型電腦、98.4% 的主機板、70.1% 的液晶顯示器、50% 的螢幕顯示器、以及全球 75%左右的晶圓代工 (資策會，2006)。

但臺灣資通訊產業現今的成就，需歸功於廠商的大幅投資於中國大陸，使其能一方面擴大產能，另方面又能大幅降低成本，而在世界市場上佔有一定的優勢。的確，從統計數字來看，臺灣資通訊產業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中國地區，在 1997 年電子業經官方核准於中國大陸投資的比例是全部的 62.5%，到了 2002 和 2003 年，這個數字分別增加到 83% 與 90%。進一步來看，資通訊產業在海外生產的比例在 1997 年只有 37.4%，但到了 2005 年這個比例則增加到了 93.2%。其中，在中國大陸生產的比例也從 1997 年的 22.8%快速增加到 2005 年的 81% (表 1)。臺灣的資通訊產業在短短的三十年間，經歷了出生、茁壯、衰退、和外移的過程，如今則是在中國大陸建立其生產基地來維持和強化國際競爭力。

假如說臺灣資通訊產業的競爭力, 在 1990 年代是奠基於並鑲嵌在臺灣社會結構的生產網絡之彈性和效率上，則這樣的生產網絡正在外移和複製到中國大陸。這樣的一個鑲嵌於和去鑲嵌於臺灣社會，並再鑲嵌於中國的過程，正是一個產業空間的再結構。而在這過程裡，臺灣的國家機器從扶植和撫育該產業在其領域之內 (Wade, 1990; Dedrick and Kraemer, 1998; Ernst, 2000; Mathews and Cho, 2000)，到面對該產業的去領域化 (de-territorialization)，以及必須重新訂定發展策略以便創造新的空間結構，來讓產業升級和再領域化 (re-territorialize) 的調適過程。

表 1　近年我國資訊產業概況

Table 1.　The conditions of Taiwan's ICT industry.　　單位：億美元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資訊硬體產業生產總值	302	338	399	470	428	484	568	696	809
海外生產比重 (%)	37.4	43.0	47.3	50.9	52.9	64.3	79.1	84.4	93.2
中國大陸地區比重 (%)	22.8	29.0	33.2	31.3	36.9	47.5	63.3	71.2	81
對中國大陸投資比重 (%)	62.5	59.6	42.2	69.6	46.4	83.0	89.9	--	--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主計處 (2004)；資策會 (2006)。

我們如何來解釋資通訊產業這樣的一個「國家敵對—經濟整合」的現象？臺灣的國家機器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全球在地化國家 (glocal state)」(Brenner, 1998) 或是熊彼得式的競爭國家 (Jessop, 2002), 在全球化的時代, 將全球經濟勢力、地方區域經濟與其國家的領域權力重新接合, 來強化國家競爭力？或是臺灣因為特殊的歷史條件，使得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趨勢相背離？本文將以空間尺度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臺灣資通訊產業全球化發展，以及國家機器對該產業去鑲嵌和再鑲嵌於中國大陸的反應和策略。本文將指出，資通訊產業的外移和逐漸鑲嵌於中國大陸的過程，與臺灣建立新國家的民主化過程同時發生，而這造成國家機器在政治發展上國族民粹 (national populist) 計畫與經濟策略的「全球在地化國家」策略相抵觸。所謂國族民粹 (national populist) 計畫，指涉的是國家機器的一種宣稱代表全民利益、並以政策和論述說詞來正當化和道德化該項政治行動的計畫，因此它所關切的主要標的是政治利益而非經濟積累。而「全球在地化國家」則指涉國家機器欲圖透過整合本地與全球化的經濟趨勢，來強化本地經濟的競爭能力，因此這樣的作法是接合多層次空間和跨越國界尺度的經濟積累策略。這個國家機器內部策略－也就是國族民粹計畫與全球在地化國家策略之間－的矛盾，顯現的是全球化和在地發展在空間面向上政治經濟角力的過程。進一步，本文將論證國族民粹計畫並無法控制資通訊產業的全球化與跨國的空間流動；相對地,「全球在地化國家」策略, 比較能相對應於現今資通訊產業的發展，然其轉變的速度，卻比不上產業流動的速度，因此呈現國家機器無能面對全球化的狀態。

空間再尺度化的政治經濟學與國族政治

近年來有關空間再尺度化的研究，說明了空間尺度乃是一個社會建構與動態過程的產物，並強調

在全球化時代，空間尺度的組合不斷被爭議、重組和重構 (Brenner, 1998; 2001; Brenner *et al*., 2003; Jessop, 2002; MacLeod and Goodwin, 1999; Swyngedouw, 1997; Mansfield, 2005)。因此，與過去將空間視為自然而然、不證自明的觀念不同，他們將之視為一個社會政治角力和演化的過程。正如 Swyngedouw (1997) 指出的，「空間尺度從來就不是固定的，其廣度、內涵、重要性和相互關係，不斷地被再定義、爭議、和重構」。

從此角度，傳統社會理論以「權力的容器」來看待國家機器及它與空間的關係之看法，已經不再適用描述當今高度流動和去領域化的全球化世界。現今國家機器在面對多變和高度流動的全球資本主義時，其規範機制已經不斷被重組和改變，而從以民族國家為單位轉變到多層次單位 (上至跨國、下至國內區域)，來管理多層次地理尺度之間的連結。如 Brenner *et al.* (2003) 認為，「現今以國家單位為尺度形式的制度規範已經不再穩固…新的政治動員、衝突和鬥爭形式已經結晶化到切割、跨過和超越既有國族國家地理疆界範圍」。這樣的國家機器型態也可稱之為「全球在地化國家」 (the glocal state)，如 Brenner (1998) 所宣稱的，這個新型態的國家機器內含了將國家尺度與次國家 (sub-national) 和跨越國家 (supranational) 的尺度接合，由此國家的領域權力與資本積累的動力重新被組合起來。

以上全球化和國家機器之間關係的論點，基本上將國家機器的功能化約到經濟積累的面向上。也就是從經濟功能的角度來看待國家機器與資本之間的關係，並認為國家機器將由於外在國際情勢的改變而採取相對應的轉型。但是國家機器在空間尺度上的調整，並不只是反映全球資本主義的動力，而且也應該是對應於國內政治勢力鬥爭的結果。從此角度，空間的再尺度化必須視為一個政治社會角力的過程，因此有必要將焦點置於社會政治鬥爭所碰觸到的空間尺度轉型的機制上。正如 Jessop (1990) 指出的，國家機器是種社會關係，是一個開放給不同利益政治鬥爭和角力的制度複合體。而這個社會政治內部鬥爭的結果，可能導致國家機器的政治霸權 (hegemonic) 計畫未必符合其經濟積累策略的目的。因為「積累策略直接關切的是經濟在國內或國際市場的擴張，而霸權計畫則主要關切非經濟類型的標的」 (Jessop, 1990)。霸權計畫強調的是「政治、智識和道德領導權」的優先性，針對的是一系列被視為國家利益的非經濟政策和目標，因此它們也具有國族／民粹主義的色彩，而在實際上它則代表了某些能夠滲透和掌握國家機器各種機制運作的特殊利益的權力。這樣的霸權政治計畫在某些歷史時刻，未必一定會與關切經濟擴張的積累策略相呼應，而後者雖然同樣反映了某些特殊利益的權力和優勢，但是其關切的領域卻是在經濟積累而非政治權力。因此，政治霸權計畫和經濟積累策略是屬於不同領域，二者也有著不同的制度邏輯。由是，當某個產業資本追求新的資本積累和新的空間擴張策略，國家機器的反應其實會是一個複雜且透過政治社會角力的過程，其結果未必會全然符合和對應於經濟積累的邏輯。

這樣的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涉及當今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國家機器在面對高速流動的資金和產業全球化時，是否已經失去治理能力？有些人認為國家機器已經失去治理能力，另外有些人則認為國家機器仍然重要，相關的理論爭議已經很多，在此不再贅述 (Hirst and Thompson, 1996; Ohmae, 1990; Leyshon and Thrift, 1997; Wade, 1996; Jessop, 2002; Weiss, 2003)。但現有的討論和辯論，基本上仍是以國家機器的經濟治理是否可以管控資本的積累邏輯的角度，而缺乏本文所討論的國家機器的政治邏輯與國家機器的經濟治理之間的關係，以及國家機器之政治邏輯與資本之積累邏輯之間關係的討論。本文認為國家機器的經濟治理邏輯與資本積累邏輯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到底民族國家在全

球化時代是否已經失去經濟治理能力，是經驗性的問題，需要從事實資料來研究和驗證。至於國家機器的政治權力邏輯與資本的積累邏輯之間的關係，則是相互獨立的領域，具有相對自主性和不同的制度邏輯。而在歷史發展上，二者的邏輯未必相對應，因此同樣的，其對應與否，也是經驗性問題，需經驗性的驗證。

以下我以臺灣資通訊產業發展和全球化的過程為例，來說明這個過程中國家機器的反應和作法是相互矛盾和不搭配的。我將指出，臺灣在 1990 年代的政治轉型使其國內政治逐漸邁向建立新國家，也就是其政治霸權計畫或民族民粹計畫，比資本積累策略被置於更優先的地位。因此，即使國家機器在同一時期也提出新的積累和空間策略，或稱之為「全球在地化國家策略」，並試圖改變既有的制度規範，來面對全球化和尋求新的空間附著性，但是這個「全球在地化國家」的積累策略，終究遭到國族民粹計畫的否定。資通訊產業的空間再領域化遭遇到國家機器的阻擾，並試圖將之拉回到國內尺度，而這樣的空間鬥爭至今仍方興未艾，但資本的全球化積累卻隨著時間不斷地擴張， 而外在於國家機器的管控範圍。

臺灣資通訊產業的建立及其空間轉化

正如前述，作為一個後進國家，臺灣在資通訊產業的發展成就令人映象深刻；但同樣地，這個產業在 1990 年代之後外移的速度也相當驚人。本節描述這個產業如何建立和鑲嵌在臺灣社會結構之中的過程，以及它又如何外移和去鑲嵌於這個社會，而導致此項工業空間形態的轉變。

(一) 產業的建立和社會鑲嵌

臺灣資通訊產業的重要性和發展，現今已經有很多的研究 (黃欽勇，1995; Kraemer, *et al.*, 1996; Dedrick and Kraemer, 1998; Ernst, 2000; Hung, 2000; 2002; Kishimoto, 2004)。這些研究大致強調以下幾個論點，來說明為何臺灣資通訊產業能夠成功：首先，該項產業的科技性質，與臺灣的制度安排有對應性，也就是由於資通訊產業是模組化生產、分散的生產結構、開放的架構，有利於臺灣大量中小企業進入該產業，而臺灣中小企業的彈性和網絡化生產，使其能快速的面對高速變化的市場要求，在極度競爭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並建立世界市場中的地位。其次，臺灣資通訊大廠透過代工和設計代工的機制，與世界領導品牌密切連結，成為市場中重要的生產者。正如 Dedrick and Kraemer (1998) 指出的，「假如有任何一個因素可以解釋東亞 (臺灣) 在電腦市場中的崛起，那就必須歸功於這些國家具有能力去發展與全球生產系統之間的強力連結，而這系統基本上是由美國公司所帶領」。第三，由國家機器所提供的制度支持，包括建立科學園區，直接介入生產領域，建立研發機構 (工研院)，協助成立研發聯盟，提供優越的租稅條件， 以及吸引海外學人回國，使得臺灣能夠與世界的科技中心－矽谷－產生緊密連結 (Saxenian and Hsu, 2001)。這個新竹－矽谷的網絡，縮減了臺灣科技學習的時間，也使得臺灣能夠快速地獲得科技前沿的知識與市場資訊。以上這些因素大致能夠解釋資通訊產業為何能夠成功地在臺灣發展和鑲嵌在臺灣社會的原因。

臺灣資通訊產業廠商與世界品牌大廠建立代工關係，大概開始於 1980 年代中期。在代工的生產形態下，買主訂定規格而由代工廠商生產，之後貼上買主公司品牌並由其行銷到市場上 (Hobday, 2000;

Wu and Hsu, 2001)。臺灣的宏碁和神通於 1985 年接受 ITT 第一批的電腦代工訂單，開啟了臺灣資通訊業代工的濫觴。隨著臺灣資通廠商的學習和技術的進步，純代工開始轉變為設計代工，在設計代工形態下，本地廠商開始進行部分或全部的產品設計。由於訂單的大幅增加，大量的中小企業投入該項產業的零組件生產，並由系統廠商開始建立本地的生產網絡 (Hung, 2000)。而由系統廠商所建立的生產網絡，使臺灣的資通訊產業能快速彈性地面對市場波動，並在 1990 年代高度競爭的市場中生存下來。據瞿宛文與安士敦 (2003) 的估計，在 1990 年代新成立的中小企業大約有 75% 的比例與系統大廠有明顯的網絡關係。

臺灣資通訊產業的成功也必須歸功於臺灣半導體產業的成就。臺灣半導體產業對資通訊產業發展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其企業發展模式－也就是晶圓代工，帶動了大量積體電路設計公司的成立，生產特用晶片而有利於資通訊產業的內部機件整合。晶圓代工模式是臺積電創新的生產模式，它為別的積體電路設計公司生產晶片而不自己設計晶片，這個企業模式與當時的整合原件設計積體電路大廠，如 Intel 公司的作法相當不同。由於臺積電是世界首家晶圓代工公司，因此也取得了先行者的地位，由於臺積電的成功，後來聯電也改變其模式，成為晶圓代工公司。這兩家晶圓代工廠的出現，帶動了臺灣大量積體電路設計公司的成立，使得臺灣的積體電路設計業的重要性在全世界僅次於美國。而臺灣半導體產業的主要產品在於特用晶片而非記憶體 (Kanatsu, 2002)，這些晶片主要為電腦和手機所使用，直接和間接地有利於臺灣資通訊產業在本地的整合和聚集，強化了該項產業在世界的競爭力。

(二) 全球化、外移與產業的去領域化

資通訊產業在 1990 年代有重大的技術變遷，主要表現在生產技術的模組化和數位化，而此劇烈地改變了全球資通訊產業生產的架構 (Sturgeon, 2002; Langolis, 2003)。由於價值鏈中各個節點的生產知識已經可以符碼化，因此它也可以毫無障礙地在網路中傳輸，而節點之間的連結也可透過傳送符碼化的資訊來達成，這大大地降低了整合和管理的需求與成本 (Langlois, 2003)。模組化的革命創造了一個新的企業組織形態，也就是 Sturgeon (2002) 所稱的「模組化生產網絡」，由於很多不同產品類型可以共用相同的程序，而使其產業結構能夠垂直分化達到範疇經濟和規模經濟的形態。

正因為一個產品可以分解為不同的模組，而且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生產，然後在特定地方再重新組合成為最終產品，現今的模組化生產網絡因此已經發展成為全球生產網絡。如 Ernst and Kim (2002) 所觀察的，由於電子業跨國公司之間的激烈競爭，導致在 1990 年代出現了一個新的組織創新，那就是跨國公司已經「從專注獨家海外投資生產的計畫，到形成全球網絡的旗艦，來整合其分散的供應商、知識和消費者，成為全球 (或區域) 的生產網絡」。處於全球生產網絡的中心就是旗艦，它擁有策略和組織的領導權，並將除了市場行銷和研發之外的所有生產流程外包給關鍵契約供應商。而關鍵的契約供應商則相對應地必須發展出新的組織能耐和技術能力，來滿足來自旗艦大廠的要求 (包括量、質、速度和彈性等)。

在此過程中，關鍵的契約供應商也大幅度地增加其運作規模，而此最終形成一個小型的全球生產網絡，由關鍵的契約供應商帶領，快速和彈性地應付來自旗艦廠商的需求。而在這個生產網絡中的下游供應商，則專注於對特定產品、生產力以及網絡連結的改良和改善，以符合來自關鍵的契約供應商的要求。這樣的一個新的全球生產網絡形態，創造了新的全球分工，也形塑了資通訊產業在全球化時

代新的和顯著的外貌。

的確，由於 1990 年代在美國及世界市場上的激烈競爭，許多大型品牌企業，像是康柏 (Compaq)、惠普 (HP) 與戴爾 (Dell) 為了達到規模與範疇經濟，大量外包給臺灣的關鍵供應商，例如宏碁、廣達、仁寶、英業達、大眾等，也形成其進一步依賴臺灣代工製造／設計方式來生產資通訊產品的諷刺情況。為了要跟上腳步並維持競爭力，臺灣的領導廠商 (或國際品牌的關鍵契約供應商) 開始外移以降低生產成本，起先是東南亞國家，後來則以中國大陸為主 (Wang, 2001)。隨著此一移動，臺灣的資通訊產業包括領導的系統廠及其生產主機板、螢幕、光碟機、集線器及網路卡的許多網絡供應商，也一起外移到中國大陸，以便在當地就近服務領導的關鍵供應商。

資通訊產業投資的區域起初是在中國南部的幾個省份，像是廣東與珠江三角洲等等。但最近江蘇與浙江省乃至於長江三角洲有後來居上之勢，事實上，長江三角洲現已取代珠江三角洲成為臺灣資通訊產業投資的重鎮。前者 (江蘇、上海、浙江) 吸引 1990 年代以來臺商投資的 52%，後者 (廣東、福建) 則占 35% (見表 2)。兩者合計占臺灣資通訊產業對中國大陸投資的 87%。臺灣資通訊產業的大量外移，對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的資通訊產業生產者提供了很大的助益，據美國《*Business Week*》(2005) 的說法，臺商貢獻了其中 40-80% 的產值。而臺灣資策會的報告則顯示在 2003 年此一比重應為 70% 左右（資策會，2003)。

表 2　核准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分區統計

Table 2. Taiwan approved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by area.

單位：百萬美元，%

期　間	1991-2006年			2007年1月			累　　計		
地　區	件 數	金　額	佔總金額比重	件數	金額	佔總金額比重	件 數	金　額	佔總金額比重
江蘇省	5,338	17,058.9	31.07	38	307.1	37.92	5,376	17,366.0	31.17
廣東省	11,657	14,657.9	26.70	21	174.3	21.52	11,678	14,832.1	26.62
上海市	4,897	8,084.2	14.73	13	76.2	9.41	4,910	8,160.4	14.65
福建省	5,097	4,402.9	8.02	14	41.2	5.08	5,111	4,444.0	7.98
浙江省	1,848	3,816.5	6.95	5	29.9	3.70	1,853	3,846.5	6.90
天津市	858	1,074.9	1.96	0	0.0	0.00	858	1,074.9	1.93
北京市	1,058	1,008.2	1.84	1	6.0	0.74	1,059	1,014.2	1.82
山東省	870	939.7	1.71	5	39.4	4.86	875	979.1	1.76
湖北省	499	502.0	0.91	0	2.0	0.25	499	504.1	0.90
以下從略	…	…	…	…	…	…	…	…	…
合計	35,542	54,898.5	100.00	105	809.8	100.00	35,647	55,708.3	100.00

資料來源：陸委會經濟處 (2007)。

註 1. 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35 條規定，給予赴大陸投資廠商補辦許可登記者已列入此一統計。

註 2. 細項數字不等於合計數係四捨五入之故。

(三) 臺灣生產網絡在中國的再鑲嵌

臺商外移至中國大陸的上海或蘇州地區的資產，不僅是有形的生產設備，也包括無形的制度安排。這是因為生產設備與生產網絡必需與制度安排相配合，方能達成快速、大規模及彈性生產，以回應全球買主的迫切需求。的確，自 1990 年代起，全球領導企業發展出新的策略以強化其本身的競爭力，同時也迫使它們的關鍵契約供應商必須以組織結構的調整來加以回應。舉例來說，為了縮短上市時間並減低庫存費用，旗鑑企業發展出一種直接下單模式，要求關鍵契約供應商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執行命令。在此情況下，康柏推行一種「98-3」操作模式，要求關鍵供應商在接單後三天內備妥 98% 的生產所需零組件，並在六天內完成最終產品裝船交給客戶。為了達成此一急迫的需求，臺灣的關鍵供應商也發展出一套低價且反應迅速的全球物流模式，將採購、生產、物流到售後服務整合成一個同步的供應鏈 (Chen, 2002)。

這種全球物流系統的成立需要建立貨品集裝中心，來匯集主要的模組並組裝成半成品 (或準系統)，以便快速的送到世界各主要市場的存貨中心。隨著臺灣資通訊產業大量的將其生產設備移往中國大陸，這些集裝中心也從臺灣遷往中國，特別是長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

王振寰與李傳楷 (Wang and Lee, 2007) 的論文描寫了臺商如何協助昆山市將臺灣的制度移植到大蘇州的過程。他們指出當地的政府 (官員) 如何透過幫助臺商，建立起類似臺灣的制度安排，以滿足臺商資通訊產業所需的速度與彈性。這點尤其表現在昆山市新建立的加工出口區上 (前引文，另見楊友仁與夏鑄九，2004)。相較於 1990 年代早期陸續引進中國的自由貿易區，此區享有「速度」上的壓倒性優勢。首先，它強調高效率且安全的直達式通關服務；其次，它盡可能簡化通關及稅務流程和手續。第三、廣泛的採用電子交易系統，這比起官僚化的人工操作有效率的多。上述作法大幅提昇集裝中心所需的速度與彈性。相較於自由貿易區，個人電腦與筆記型電腦通關時程已由 72 小時縮短到 4-6 小時，整機出貨給客戶的時間也從原本的 14 天減少到只需 7 天 (楊友仁與夏鑄九，2004)。

昆山市是第一個引進此套新制度的地方。然而，由於中國各地方政府的激烈競爭，最初是毗鄰的蘇州市，隨後是其他區域，這套制度安排很快的便擴散出去。由於這套仿自臺灣的制度搭配成功轉移，臺商享受到與以往在臺灣時相同甚至是更具效率的服務。的確，中國地方官員發展當地經濟的需要，與臺商對生產速度的需求，二者之間產生的策略性連結，實有助於將臺灣的軟性制度移轉至中國大陸，這同時促使臺商的生產網絡 (從臺灣) 再鑲嵌並再領域化於中國的土地上。這種趨勢近年來尤其顯著。2005 年底時，臺灣最後一條筆記型電腦生產線也移到中國蘇州。

臺商對大陸的投資，一方面使其能充分利用大陸的便宜生產要素，擴大規模和降低成本；另方面由於大型品牌廠商的要求，使其發揮了組織彈性的長處，形成小型全球生產網絡，並有效運用全球運籌的功能，成為全球資訊產品主要的關鍵供應商。然正如前述，蘇州各級政府的積極搭配，建立相關的制度，更是使得臺灣資訊大廠能夠具有擴大規模、彈性和速度的關鍵，這些種種因素的匯流整合，使得臺灣資訊業雖然再鑲嵌於中國領土之內，但卻能有效全球運籌，而具有運作全球尺度的能力。不過，必須指出的是，臺商的再鑲嵌於蘇州，雖然至今為止主要仍然是臺商之間網絡從臺灣到蘇州的複製，而非臺商與中國廠商建立了網絡關係，或網絡關係被中國廠商取代 (楊友仁與夏鑄九，2004；Wang and Lee, 2007)。然隨著中國本地廠商技術水準的提高，以及臺灣廠商的成本考量，臺灣資訊大廠仍有

可能將部分低階產品外包給本地廠商，如此的話，臺商的再鑲嵌於蘇州也將更徹底而具有「在地化」的趨勢 (張家銘，2006)。

(四) 國家機器再尺度化的矛盾策略

臺灣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與民主化的過程共伴而生，臺灣建立新國家的衝動與國民黨政權所強調的「大中國」意識，在國家及國際政治層次也多所扞格。要言之，臺灣的民主化過程主要是由本省人與崛起的中產階級所主導的民主運動，挑戰長期將臺灣人排拒於權力核心之外的國民黨威權統治政權。此一反對運動力量最終在 1986 年轉化為一個以鼓吹臺灣意識並提倡臺灣獨立的政黨—民進黨. 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國民黨的改革派聯合民進黨以取得其黨內鬥爭的勝利，並在 1990 年代初期將黨內保守派外省人逐出權力核心。臺灣的民主化過程在 1990 年代中期造就了一個新國民黨政權，它持續不斷地進行國家機器的改造及新民族國家的肇建。舊的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國家結構是設計成一個代表全中國的架構，而現在的改革則逐漸限縮至其實際領有的臺灣，中國色彩亦不可避免的快速褪去 (王振寰，1996)。

新民族國家的肇建乃是一個去中國化與鼓吹臺灣化的雙重過程。在舊國民黨的論述下，臺灣只是附屬於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因此，臺灣意識在 1980 年代以前被視為是一種叛逆並禁止公開討論的議題。稍後，新的國民黨政權不僅鼓勵臺灣意識，並將之視為一種正當的國家認同。以 Jessop 的話來說，新的政權透過民粹動員、民族國家肇建與國家機器的重構來實踐一種新的「霸權計畫」—建立以「臺灣人」為主的主權獨立國家，作為其施政和動員支持的道德基礎。與國家認同有關的類似議題像是臺灣人 vs.中國人，或臺灣國 vs.中國廣被提起，並透過建立內部敵人 (國民黨＋外省人) 和外部敵人 (中國) 來強化其「臺灣人的尊嚴」的各種口號和作為。臺灣政治轉型的結果，不可避免的導致了這種新的「國族民粹」計畫的出現，並由此而引起島內的族群衝突與海峽兩岸間緊張的升高。這種臺海緊張關係自 2000 年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取得執政權以來更不斷加劇。

隨著經濟整合不斷的加速擴大和深化，臺灣的國家機器自 1990 年代中期即面臨如下困境：當它宣稱臺灣在國際政治上為一主權獨立的國家以對抗中共「一個中國」政策的同時，其經濟發展卻不斷的與其敵人進一步地整合在一起。由於臺灣的國家機器已經體認到中共可以用商業利益作為推動「一國兩制」的手段，並察覺臺灣經濟過於依賴中國市場的情況日益明顯，故提出若干策略來因應這些挑戰。這些策略可以畫分為兩大類：抑制整合趨勢的國族／民粹主義計畫，另外則是全球在地化的國家策略 (Brenner, 1998; Jessop, 2002)，試圖在高速流動的全球與區域經濟中尋找新的空間定位。然而，這兩種策略本身卻存在難以化解的矛盾，並造成政治與經濟領域間的制度不搭調 (de-coupling)。

國族／民粹主義計畫是一種強調國格優先性的策略，其特色是常因為著重政治的短期利益而忽略了經濟的長期福祉。因此，國族／民粹主義計畫最關心的是非經濟的「國家」利益，往往不利於經濟積累 (Jessop, 1990)。事實上，自 1990 年代中期起，國家機器宣揚臺灣為一獨立民族國家的作法，主張將「中國」正名為「臺灣」。在臺灣優先的大旗下，臺商投資中國大陸往往被視為一種不忠甚至是叛國的行為。為了抑制整合的趨勢，國家採行幾種政策來「協助」臺商分散他們的投資：例如 1994 年推動的「南向政策」鼓勵臺商以東協國家為標的來取代對中國的投資，中美洲計畫則是幫助臺商在幾個中美洲國家取得製造設備，以收鄰近北美主要市場之利。更有甚者，為了限制大企業投資中國，政府

於 1996 年 9 月推動所謂「戒急用忍」與「根留臺灣」政策，以限制對中國大陸的貿易及投資。此一政策限制高科技產業 (如半導體) 赴大陸發展，而超過五千萬美元的基礎建設也在被管制及禁止之列。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政府同時也禁止銀行等特定產業及服務部門投資中國大陸。

2000 年之後，新上任的民進黨政府更加向國族民粹主義靠攏。例如陳水扁總統在 2002 年 8 月宣稱「臺灣中國、一邊一國」，並主張應訂定公民投票法來保護臺灣主權獨立。2003 年 11、12 月，在完成有主題限制的公民投票法之後，他繼續宣稱要推動全民制憲公投，以建立臺灣成為一個正常、完整而偉大的國家 (Lawrence and Dean, 2003)。至於臺灣往中國的鉅額投資，新政府推翻先前國民黨政府政策，改為強調「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後再更改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然而，不管這些表面文字為何，國家機器的目的都是要嚴加管控前往中國的鉅額投資，以期使衰退的經濟表現能夠重回國家掌控。在資通訊產業方面，是否該允許半導體廠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便引起爭議。廠商希望可以到經濟快速崛起的中國投資，以期擴大市場佔有率，然而國家機器則擔心先進技術可能因此外流，遂以國家安全的理由予以反對。最後爭議的結果為允許最多三家廠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廠商必須在臺灣進行更多的投資，且技術規格限定在八吋晶圓廠、點一八微米製程以下 (經濟部投審會，2006b)；此外，這些外移到中國的投資必須經過更嚴格的審核程序。國家機器的策略就是意圖將資通訊產業重新劃歸在其規範機制之下。

臺灣的第二個策略－全球在地化國家取向 (global state approach) 的策略，其觀念意圖在全球化歷程中，透過國家疆域內組織的再連結 (re-articulation) 與再轉化 (reconfiguration)，將國家經濟串接並嵌入全球—在地 (global-local) 的空間中 (cf. Brenner, 1998; 2001; Jessop, 2002)。全球在地化國家取向的策略承認全球化趨勢的不可抗逆性，重新塑造最初鑲嵌在地方的經濟發展政策，以搭配全球資本積累的動態性並創造更高層級的國家競爭力。臺灣的全球在地化國家策略明確地包含兩套主要政策：首先，推動臺北成為全球城市，以建立區域性的金融中心來服務無國界和高速流動的資金 (Wang, 2004; cf. Martin, 1994)；第二，創造新的策略產業及創新氛圍來活化經濟動力，追求經濟升級。

臺灣的全球城市策略意圖提昇臺北的競爭能力，以期在 20 世紀 90 年代末期及 21 世紀能在崛起中的東亞經濟區塊中扮演區域中心的角色 (金家禾，1999；Ching, 2005; Wang, 2004)。全球城市策略—或稱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其政策意圖一方面增進臺北的實體基礎設施，另方面則在建立新的商業及金融中心 (信義區) 成為「臺北曼哈頓」，吸引全球及本國金融與先進服務廠商進駐 (周素卿，2003)。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國際金融中心大樓的落成 (臺北 101)，此棟大樓被設計為全球最高樓，象徵了臺北決意成為全球城市及東亞地區金融中心的意圖。全球城市計畫也希冀可以將臺灣的資通訊廠商與國家品牌大廠更緊密地連結，為本國廠商吸引更多的無國界資金，支撐臺北成為崛起中的亞太經濟體的區域中心地位。

除了全球城市的計畫外，臺灣的產業政策同樣希望可以藉由技術升級促進經濟發展。政策首先是吸引外國及本國廠商投入更多的資金，以避免有更多的資本持續外流到中國大陸。第二則是吸引外國及本國廠商設立創新及研發中心，透過技術升級使經濟本質朝向以創新為主體的經濟體。針對第一個政策，國家策略包括放寬土地與環保限制來促進投資，提供更多的租稅誘因，以鼓勵臺灣廠商回國投資－稱之為臺灣優先投資計畫；敦促臺灣廠商在臺灣設立營運總部表示根留臺灣－稱之為營運總部計畫。

而在將經濟發展重新導向以創新活動為主體的面向上，國家策略一方面是鼓勵傳統製造部門投入更多研發經費，以期在價值鏈上有所提昇；另方面則是為下一輪的國際競爭，將資金集中投入於少數新興產業，如 TFT-LCD 產業及半導體奈米製程。例如，臺灣在新一輪 (2002-2008) 的經濟計劃中，設定三個全新的目標，企圖使臺灣成為以創新為基礎的經濟體。首先是「跨國創新研發中心計畫」，希望跨國公司可以在臺灣設立區域研發中心；再來是鼓勵本國廠商在臺灣建立研發中心；第三是增加更多的研發活動投入，預計在 2008 年可以達到整體 GDP 的 3%。自 2002 年 5 月推動至 2004 年 6 月止，已經有 20 家跨國企業建立 23 個研發中心，同時本國廠商也建立了 67 個，其中許多屬於資通訊產業，例如 IBM、Intel、Dell、Microsoft、HP、Sony、臺積電、聯電、宏碁、緯創、英業達、建興、明基、奇美、廣達等 (經濟部投審會，2006a)。為了培育科技聚落及網絡，臺灣國家機器在臺南及臺中新設立兩個新科學園區，以提供更多的空間給高科技產業使用，例如生物科技、光電、半導體及 TFT-LCD 及其相關產業。

臺灣國家機器的全球在地化國家策略顯然嘗試藉由新的制度安排，培育集體學習和創新活動，以建立一個具有學習和創新能力的經濟體；並企圖透過本地廠商的技術升級、讓處於中國大陸的子公司生產較低階的產品，以擴大兩岸間的勞動分工差距。整個策略試圖在高速移動的市場經濟中，尋找新的空間固著 (spatial fix)；同時，這也是臺灣國家機器在許多臺灣廠商外移製造工廠至中國大陸的本地脈絡環境下，為了重建、重組、重鑲嵌生產網絡所採取的新的空間策略。

盡管如此，臺灣的全球在地化國家策略卻與其國族／民粹主義計畫相牴觸；後者事實上已凌駕前者。國族／民粹主義計畫所關心的議題為獨立建國及國家安全，其主要推動者為陳水扁總統；相對的，全球在地化國家策略及相關政策的提議及督導者為經濟和科技官僚，並不擁有足夠的權力加以充分實踐。許多全球在地化國家策略僅由陳總統隨意地在一般演說中提及，事實上卻遭到他的國族／民粹主義計畫阻礙而無法施行。例如，臺灣國家機器對資本移動的控制、對兩岸直航的限制，不僅造成臺北成為區域金融及營運中心計畫的失敗，也使臺北無法成為國際採購辦公室的聚集城市 (Wang, 2004)。由於國家機器的限制及嚴格管控，許多跨國公司已經將其區域採購辦公室從臺北移至香港或上海。並且，由於臺灣國家機器對資本移動的嚴格管制，許多主要的資通訊廠商為了能夠便於獲得無國界資金的挹注及接近中國市場，寧可選擇至香港股票市場上市而非留在臺北 (至 2006 年底為止，有 41 家臺商在香港上市，包括鴻海的富士康)。此外，銀行不能前往中國大陸投資的限制，也使許多資通訊廠商必須自行籌資，無可避免地迫使廠商向中國本地銀行申請融資貸款，進一步加深廠商與中國大陸本地的鑲嵌關係。

由於民主化的發展，臺灣過去發展型國家的模式—政治領袖充分信任科技官僚並與之密切合作 (康綠島，1993；Wade, 1990)，來推動經濟發展的情況已經不再。民主化和國族民粹國家計畫的發展，使得政治的短期利益凌駕於科技官僚較為長期的規劃，且經濟發展的規劃也需服膺於短期的政治利益考量之下，造成國家機器不只無法有長期計畫，且內部不再具有一致性。這種內部的不一致性，顯現出來的就是國家機器的無能和無力控制經濟和發展，最終導致科技官僚體制的無能和崩壞，對國家發展不再有長期規劃，而只有短期考量。另方面，即使國家機器努力想要控制資本的流動，但是統計的事實和趨勢說明了這樣的作法，並無法達成目的。

的確，從統計數字，我們可以觀察到臺灣資通訊產業，在大陸生產投資的比例是逐年增加，並未

隨著國家機器的拉扯而有所改變。例如資訊產業的海外生產比重從 1997 年快速增加到 2005 年的 93%，而其中在大陸生產的比重在同時期更從不到 23% 快速增長到 81% (見表 1)。這樣對大陸投資大幅增長的趨勢，並未由於國家機器的嚇阻而有任何減少。這一切似乎顯示了國家機器國族民粹計畫對於資本的流動，並無法產生阻擋作用。資本仍然以它自己的邏輯和方法，實踐其積累的目的。換言之，國家機器的政治邏輯或國族民粹計畫，在面對資本的全球化時，能產生的作用其實是有限的。

另方面，臺灣國家機器的全球在地化國家策略，目的雖然在促進技術升級及創新，不過由於這需要時間來實現，因此短期之內效果仍然有限。然而也由於中國市場的強大吸引力所帶出的效果，讓臺灣的國家機器在此方面難以過度樂觀。不僅在中國大陸設立區域研發中心的跨國公司較臺灣為多。例如，2001 年中國有 110 家 (江小娟，2002)，而臺灣在 2003 年則為 20 家，許多臺灣資通訊廠商也同樣在中國大陸進行研發活動。根據一項最近的調查，接受問卷調查的臺灣廠商中，有 47.56% (82 家中的 39 家) 在中國大陸的活動從簡單生產擴大到研發活動。雖然上述發現仍嫌籠統而不能真正說明什麼，但可以推知在中國的研發內容大致以改善既有產品、並在部份程度上為中國本地市場發展新原料或零件為主，而臺灣則是專注於開發新產品及更高階的製程，以滿足國際市場需求 (Chen, 2004)。但是這樣的趨勢卻顯示出兩岸的勞動分工正在轉變當中。國族／民粹主義計畫與推動創新經濟升級的全球在地策略的衝突，有明顯日漸對立的趨勢：由於創新所需的新的空間固著需要時間來具體成型、新的制度安排也有待建立、一切成效都尚未明朗；然而國族/民粹主義在短期內立即可見的經濟影響，已經使外國及臺灣廠商在中國的活動加溫，以便利用當地低廉的技術人力。

確實，臺灣國家機器的國族／民粹主義計畫與全球在地化國家的策略是自相矛盾的。臺灣國家機器認為維持獨立及民主政體的政治利益，是在資通訊廠商甚至整體經濟積累的利益之上。可以觀察到的是，正當臺灣國家機器在其國家疆域內，以眾多規範往下拖累資通訊廠商的同時，這些廠商已經重新鑲嵌在中國的土地上，並擴展到全球規模。結構與空間的分離如此明顯，使許多臺灣資通訊廠商紛紛到離岸金融中心註冊為外籍公司，以規避臺灣國家機器的嚴格規範。空間再尺度化的角力和鬥爭仍在持續當中，而國家機器並無法有效規範它們。

結　論

本文以空間尺度政治經濟學觀點描繪臺灣一方面與中國經濟逐步整合，另方面政治卻益發緊張的兩難困境。現有的多數研究在理論上認為，全球化的經濟會造成國家機器逐步成為全球在地化國家類型 (Brenner *et al.*, 2003)；但透過了解臺灣資通訊廠商為因應發展中的全球生產網絡，而去鑲嵌於臺灣、再鑲嵌於中國的案例，本文認為臺灣國家機器的反應並不符合上述的討論方向。相反地，臺灣國家機器的反應是自相矛盾的：國族／民粹主義計畫試圖將外移資本帶回其管控之下，然而全球在地化國家策略則是朝向擁抱全球化趨勢。不過本文也指出國族／民粹主義計畫凌駕於全球在地化策略之上，使資通訊廠商與國家機器在空間尺度面向上持續角力的同時，卻愈益深深鑲嵌於中國的領土之內。由此，本文也推論，資通訊產業的全球化發展，國家機器的嚇阻能力相當有限。

本文也試圖將現今的空間尺度政治經濟學觀點帶入國家層級的分析。本文同意全球化時代下的國家機器必須重塑及重構，以滿足多尺度治理的再尺度化觀點。然而，本文也強調本地／國家的政治力

量仍然至關重要；國家機器面臨全球化挑戰所做出的反應仍根植於其特有的國家脈絡，必須經過策略性選擇及鬥爭。全球化下的臺灣資通訊廠商與臺灣國家機器自相矛盾政策的尺度鬥爭是種歷史的產物；到底目前政治與經濟分離的現象會加深成為危機、或是演化為另一種對偶結合，答案仍然未知，而這很大部分仍必須端賴於臺灣政治經濟舞臺上的社會及政治的角力和爭鬥。

最後，到底國家機器在政治上的「國族民粹」計畫與經濟策略的「全球在地化國家」策略之間相抵觸，是臺灣的特殊性，還是普遍現象？從制度分析的角度，臺灣並不特殊，因為政治邏輯考慮的是權力，而經濟邏輯考慮的是資本積累，二者是相互獨立的制度領域。直到 21 世紀的今天，我們仍看到不同國家因為種族或宗教因素而發動戰爭，並不考慮經濟是否得以發展，或是人民是否可以增加生活上的富裕。但從另一角度，臺灣也是相當特殊，因為很少國家機器具有民族國家的各項特質 (土地、人民、軍隊)，卻又在國際上沒有任何主權地位，且在國際上被視為其他國家的一部份。這造成現今臺灣政治經濟發展的困境來源，也是現今政治與經濟分離、國家機器與資本之間空間鬥爭的深層原因。而這部分，並不是以經濟理性或全球在地化的國家策略能解決的。

引用文獻

王振寰 (1996) **誰統治臺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臺北：巨流出版社。

江小娟 (2002) **中國的外資經濟對增長、結構升級和競爭力的貢獻**，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行政院主計處 (2004) 國情統計通報：近年我國資訊產業概況 (1 月 13 日公布)，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5451&ctNode=3233 [2007.1.25]。

周素卿 (2003) 全球化與新都心的發展：曼哈頓意象下的信義計畫區，**地理學報**，34: 41-60。

金家禾 (1999) 邁向世界都市之臺北都會區產業結構與空間分佈變遷，**都市與計畫**，26 (2): 95-112。

康綠島 (1993) **李國鼎口述歷史：話說臺灣經驗**，臺北：卓越文化公司。

張家銘 (2006) **臺商在蘇州：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考察**，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陸委會經濟處 (2006) 表十三我國對外投資統計—國家 (地區) 別，**兩岸經濟統計月報**，157: 33，http://www.mac.gov.tw/big5/statistic/em/157/13.pdf [2007.1.25]。

陸委會經濟處 (2007) 表十一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地區別，**兩岸經濟統計月報**，170: 31，http://www.mac.gov.tw/big5/statistic/em/170/11.pdf [2007.3.2]。

黃欽勇 (1995) **電腦王國** R. O. C.：Republic of Computers **的傳奇**，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楊友仁、夏鑄九 (2004) 跨界生產網絡的在地化聚集與組織治理模式：以大蘇州地區資訊電子業臺商為例，**地理學報**，36: 23-54。

經濟部投審會 (2006a)「中華民國招商網」網頁 (營運總部與研發中心)，http://investintaiwan.nat.gov.tw/zh-tw/opp/inds/hq_rd.html [2007.1.15]。

經濟部投審會 (2006b) 放寬 8 吋晶圓製程技術赴大陸投資政策相關說明 (12 月 29 日公布)，http://www.moeaic.gov.tw/system_external/ctlr?PRO=NewsLoad&id=508 [26 January 2007]。

資策會 (2005) **資訊工業年鑑**，臺北：資策會。

資策會 (2006) **資訊工業年鑑**，臺北：資策會。

資策會 (高鴻翔) (2003) **中國大陸資訊產業競爭力分析**，臺北：資策會。

瞿宛文、安士敦 (2003) **超越後進發展－臺灣產業的升級策略**，臺北：聯經出版社。

Brenner, N. (1998) Global cities, glocal states: global city formation and state territorial restructuring in contemporary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5 (1): 1-37.

Brenner, N. (2001) The limits to scal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scalar structur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5 (4): 591-614.

Brenner, N., Jessop, B., Jones, M. and MacLeod, G. (2003) *State/Space: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Business Week (2005) Why Taiwan matters? *Business Week Online*, May 16.

Chen, S. H. (2002)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ase of Taiwan,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9 (3): 249-56.

Chen, S.-H. (2004) Taiwanese IT firms' offshore R&D in China and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 *Research Policy*, 33 (2): 337-49.

Ching, C. H. (2005)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producer services and growth constrains. In: Kwok, R. Y.-W. (ed.) *Globalizing Taipei: Political Economy of Spatial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35-54.

Dedrick, J., and Kraemer, K. L. (1998) *Asia's Computer Challenge: Threat or Opportun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rnst, D. (2000) What permits David to grow in the shadow of Goliath? The Taiwanese model in the computer industry. In: Borrus, M., Ernst, D. and Haggard, S. (eds.)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110-140.

Ernst, D. and Kim, L. (2002)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local capability formation, *Research Policy*, 31: 1417-1429.

Hirst, P. and Thomson, G. (l996)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London: Polity.

Hobday, M. (2000) East versus Southeast Asian innovation systems: comparing OEM- and TNC-led growth in electronics. In: Linsu, K. and Nelson, R. (eds.) *Technology,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Experiences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9-169.

Hung, S.-C. (2000) Institutions and systems of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aiwan's computer competitiveness,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2: 175-87.

Hung, S.-C. (2002) The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hard disk drive an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industries, *R&D Management*, 32 (3): 179-190.

Jessop, B. (1990) *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Jessop, B. (2002)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Polity.

Kanatsu, T. (2002) *Technology,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Policy: Government of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Kishimoto, C. (2004) Clustering and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Taiwanese personal computer industry. In: Schmitz, H. (ed.) *Local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ssues of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33-264.

Kraemer, K. L., Dedrick, J., Hwang, C.-Y., Tu, T.-C. and Yap. C.-S. (1996) Entrepreneurship, flexibility,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Taiwan's computer industry,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2: 215-249.

Langlois, R. N. (2003) The vanishing h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2 (2): 351-85.

Lawrence, S. and Dean, J. (2003) A whole new conflic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 18): 16-21.

Leyshon, A. and Thrift, N. (1997) *Money Space: Geographies of Monetary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MacLeod, G. and Goodwin, M. (1999) Space, scale and state strategy: rethinking urba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3 (4): 503-527.

Mansfield, B. (2005) Beyond rescaling: reintegrating the 'national' as a dimension of scalar relation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 (4): 458-473.

Martin, R. (1994) Stateless monies, glob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economic autonomy: the end of geography? In: Corbridge, S. (ed.) *Money, Power and Space*, Oxford: Blackwell, 253-278.

Mathews, J. and Cho, D.-S. (2000) *Tiger Technology: The Creation of a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hmae, K. (1990) *The Border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linked Economy*, London: Fontana.

Saxenian, A. and Hsu, J.-Y. (2001) The Silicon Valley-Hsinchu connection: technical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0 (4): 893-920.

Sturgeon, T. J. (2002)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 a new American mode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1 (3): 451-96.

Swyngedouw, E. (1997) Neither global and local: 'gloc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Cox, K. (ed.)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NY the Guilfrod Press, 137-66.

Wade, R.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de, R. (1996) Globalization and its limits: reports of the dea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In: Berger, S. and Dore, R. (eds.) *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60-88.

Wang, J. H. (2001) Governance of a cross-border economic region: Taiwan and southern China. In: Drover, G., Johnson, G. and Tao, J. (eds.) *Sub-Regionalism in China and East Asia*, Commac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117-134.

Wang, J. H. (2004) World city formation, geopolitics, and local political process: Taipei's ambiguous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8 (2): 384-400.

Wang, J. H. and Lee, C. K. (2007)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local institutional buil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in Suzhou,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9 (8): 1873-1888.

Weiss, L. (2003) Introduction: bring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 In: Weiss, L. (ed.) *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Bring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3.

Wu, S. H. and Hsu, F. B. (2001) Towards a knowledge-based view of OEM relationship building: sharing of industrial experience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2 (5-6): 503-523.

2007 年 3 月 19 日　收稿
2007 年 6 月 4 日　修正
2007 年 7 月 9 日　接受